

向未来出发

——国庆观礼日记

陈祖芬

毕竟,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虽然比贫嘴张大民强,但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一路走来,对西服这种异物自有排斥感。今天梁晓声说及他前两天打的,出租车司机问他是做什么的,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教授,只说是教书的。司机打量他说不是。晓声说那你说是做什么的。司机说:勤杂。我笑,我说我好大年纪了在外采访,还免不了有人问我:你是插队回来的吧?

无非是我喜欢斜挎一个帆布书包,我说。晓声说:我们见面总有N次了吧?我还真没见过你穿什么好衣服。

我想,我的好衣服都让我做的几百个娃娃穿了,她们要多时尚有多时尚,个个都可以去当时装模特,21世纪有句流行语:没有做不到,只有想不到。我的娃娃们是“90后”,或是本世纪生人。她们全是祖国花朵。今天的中国女孩属什么?属花朵。

网上有文谈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,富起来了,美起来了。今天观礼台上的女性,自然都希望在这个庆典上以美丽示人。有多少个女性就有多少种美丽。我想,阅兵之前不如先阅人呢。

10月1日9:00, 60年前,驴子拉着大炮通过天安门

庆祝大会还有1小时开始,观礼台上倒好像在举行照相热身赛。同样的场景,一千个相机里就有一千个中国。

站在观礼台上看长安街,看不到头,只看见阳光在未来照耀。要是从天安门拱形门洞望进去,那,看到的是一条时间隧道,从2009年到1984年到1976年到1949年到1901年……

1964年10月2日,建国15周年,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在人民大会堂首演。那时我第一次来北京,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。那是个雨天,我穿着雨鞋走到大会堂里的楼梯旁,就不敢再走了。楼梯上铺着红地毯,我这辈子从没用我的脚踩过地毯,更别说踩人民大会堂的地毯,更别说用我的雨鞋。我好不容易狠下决心溜边走上二楼,还没定下神来,一回头,周总理走来了,就跟我刚才走进来那样,我是说,就好像一个普通的观众那样。他的座位也在二楼。我怎么也想不到总理就这么平易地出现了,从此我再也忘不了他那决不平易的眼睛。那晚我给在上海的爸

妈写了11页的信,关于红地毯,关于周总理,关于《东方红》。

事隔12年,1976年的三九严寒,我天天午夜从东单走到天安门广场,悼念周总理。泪水滴在地上就是冰。广场的空间铺满了人,广场的地上铺满了冰……

天安门广场,用大色块留下了一个个时代的公共记忆。

东方红的时候,1949年,开国大典阅兵,我从网上看到,受阅的武器很多是缴获的,产自二十几个国家。大炮是由驴子拉着通过天安门的,好在驴子是“中国造”。即使是“中国造”的驴子也特叫人提神,因为,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

当然,绝对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。今年新中国六十庆典,安全工作的量恐怕不是我辈能想象的。解放初特务多,但那时他们的科技含量低。如今重温过去岁月,电视上有看不过来的抓特务的片子。在哪份报上见过这样一个标题:有多少特务可以重抓?毕竟,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安定,现在的人有余裕之钱和余裕之心,越来越有幽默感了。

10月1日10:37,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

阅兵分列式开始,《解放军进行曲》一响起,我的泪水一下涌起。其实,我的阅兵式早几天就开始了。我在网上早已阅了个大概,早知道今天阅兵式上,52型主要装备全部都是中国造。知道有56个方队——徒步方队14个,装备方队30个,空中梯队12个,还有12个空中受阅梯队。还有还有还有,我好像突击修了一门军事课。

但是,一句“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”,我的热热的泪从胸部下方升腾而起,直冲向喉部再冲向眼睛,而且把我网上阅兵的经历冲个精光。步兵方队、水兵方队、特种兵方队、预备役方队、海军学员方队、飞行学员方队、二炮学员方队、三军女兵方队、空降兵方队、女民兵方队等等等等,那一个个方队,是一个个不同色块的传送。长安街原来是一条宽宽的传送带,那迷彩的、纯白的、军绿的、玫瑰红的色块,只要放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前,一声“向右看”,就觉得有人按下了电子按钮,一个方阵刷地从齐步转为正步走。又好像一排排琴键,齐刷刷弹起,弹起!机器人的最高境界是等同真人,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?是能组成机器——为了共同的爱,为了我们的祖国。每一个方队都有程序的设定,这一道

程序,叫做:当祖国需要的时候。

方阵进入这个程序的时候,看不见个人,只看见挥动的白手套和甩起的黑皮靴,只看见手套白和皮靴黑的交织。传送到下一个方阵,或是白手套和白皮靴的辉映。最靓丽的女民兵方队,服装是玫瑰红的,靴子、帽子、腰带、手套、甚至枪套,一水儿的纯白。那也不会看到个人的存在,只能被这红与白的交织震撼。
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! 这一个个方阵,从历史深处走来。走过南昌起义,走过抗日战争,走过解放战争,走过抗震救灾,以铁军的步伐,以长征的足迹,开天辟地前赴后继,当祖国需要的时候!

当军车隆隆开过的时候,可能旁人见我看得投入,问我这叫什么这叫什么,我完全不懂。我给自己买的无数的玩具里倒是有几辆迷彩坦克,关于坦克的全部知识,便是装上4节5号电池,就可发动起来。如果有一天,全世界的人都退步到——不,不如说是全世界的人都进步到对武器完全不懂,那么,小小寰球迎来世界大同!

也许,这永远只能是一个“如果”。

10月1日12:25之前,未来在他们脚下

所以,当游行队伍里出现同一个世界方阵,真叫我惊喜!彩车上有外国友人也有从海外学成归来的,改革开放30年,我们派出去的留学生有139万多,回国的有59%多。出门求学是一种进步,回来报效更是一种进步。所有的进步都因了4个字:改革开放。

1984年,国庆35周年,蛇口工业区的彩车上有一行大字: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。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。后来流行了多年,再后来变成陈词滥调,再再后来被弃之脑后,好像人人天生都知道的常识,谁不会说呢。如果谁还用这两句话教导人,那么,借用一句时下常用的广告语:你out啦!就是说,你落伍啦出局啦。

新农村建设方阵的彩车上,就稳稳地站着农民致富带头人。天安门前翻出大大的绿地黄字:改革开放。这4个字,印在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,印在共和国每一方空气里。这不是标语不是口号,是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呐喊!是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祈祷!

游行的方阵,是一个个白的色块、黄的色块、红的色块、蓝的色块,远远看去像各种色彩的波浪,与时代同步,向未来出发。七色光少先队鼓号方阵,男孩女孩一律穿着红白两色的服装,击着鼓,吹着号,奏着中国少先队队歌,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笔!孩子们的彩车上,亮出4个灼热的大字:祖国万岁!5000多名少年儿童放出了一天气球,歌唱祖国的声音随着气球升腾而起。鼓号方阵一路击着鼓,吹着号,他们就这样一直走下去,未来是他们走出来的。未来在哪里?未来在他们脚下!

祖国万岁!

(压题照片:陈祖芬摄)

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,全国人民欢欣鼓舞。作为一个海外归侨,1936年参加革命,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离休后仍然是个不穿军装的老兵,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60华诞,回忆百年前腐败的满清政府,任凭西方强盗瓜分国土;回忆甲午战争以后东洋日寇得寸进尺,想起战争年代流血牺牲,想起“文革”十年的灾难;反观改革开放后工农业突飞猛进,综合国力不断提高;全世界金融海啸,我国一枝独秀,教我怎么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呢?

前些日子平津战役纪念馆,向我索要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题词,我以打油诗的形式,写了两句话:

其一:白山黑水作战场,三下江南保临江;关门打狗擒贼寇,东北将军全灭亡!

其二:百万雄师战平津,英明决策困古城;傅部识时顺民意,红旗飘飘人欢腾!

辽沈与平津两大战役期间,作为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,日夜在战场上奔走,我写了十数篇战地通讯,经电台播放,在各地报刊上登载。

1948年9月下旬,我随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,从长春前线转到辽西战场。10月9日部队缴获蒋军廖耀湘兵团一个公文包,内装着将军官兵的家信和一些宣传品。张天涛团长把它交给我。我发现在廖耀湘的手令中说:这次离开战斗,是要和关内的国军东西对进,夹击东北共军,与共军决战!于是他号召全体官兵努力战斗,战胜者可以越级提升,失利时要战到最后兵一卒!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,手下5个军12个美械师。但他色厉内荏,率部从沈阳出来,走两步退一步,日行数十里,后又退十几里,并在住地挖战壕修碉堡。当他强攻黑山,被我十纵队迎头痛击,解不了锦州之围。锦州解放后,我几个纵队掉头东进,包围廖耀湘兵团于辽西战场,他如惊

弓之鸟,先逃向营口,被我军在北宁铁路上的姚家窝棚和厉家窝棚堵击,又逃向沈阳,并下令各军分散突围,给了部下各军师长开了方便之门,全都换便衣逃亡,丢下几十万下级官兵,像无头苍蝇到处乱窜!

有一天晚上我随着16师师长李作鹏和政委张池明,从彰武渡过饶阳河走了170里路,进到北宁路,部队将逃向营口的蒋军,堵歼在姚家窝棚和厉家窝棚。大批蒋军转向沈阳逃亡!丢下大量的榴弹炮重迫击炮和坦克战车,许多战马到处乱跑……

漫山遍野是逃散的蒋军。我们喊“缴枪不杀”他们便把枪扔下,抓的俘虏太多,便叫他们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集合。在一个集合点,我看到十几个蒋军在晒太阳捉虱子,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,回答竟有五个军的番号。

什么叫“兵败如山倒”?什么叫“尸横遍野”?我当兵十几年,在辽西战场上,才有形象的感觉,深刻的体会。战后第二天,我骑着一匹新缴获的白骡马,到战场上遛马。东北10月天寒地冻。许多老百姓正用斧头锯子,在砍锯死马的肉,准备拿回家饱餐一顿。我身下的坐骑,看见那么多死人死马,吓得乱跑。我只好骑着回屯子。

屯子里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,是

廖耀湘的家用车。车上有床大睡袋。张池明政委把它送给我。

辽沈战役结束,我军原想作短暂休整,毛泽东去电要求趁热打铁,迅速进关。我军进关时,正式改名第四野战军。我跟随43军17师。师长龙书金是一员善打巷战的虎将。打锦州龙书金作为尖刀师打巷战,打天津仍然是这个师。

1949年1月14日下午,我在天津西的杨柳青庄外打谷场上,看着四野刘亚楼参谋长指挥作战,他一声号令,几十门榴弹炮、重迫击炮同时怒吼!震耳的响声下,密集炮弹飞入天津城内,轰击城内的碉楼地堡。城上空冒起一团团浓烟!

进攻天津城西和平门的我38军和39军的勇士,渡过护城河登上城垣,立即向纵深发展,激战十几小时,

我38军副排长邢春福,带领几个战士,攻进天津警备司令部海光寺的地下室,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。原准备固守数月的天津,我军只用十几小时即全部解放!

我军攻进和平门时,傍黑天,我跟在龙书金的身旁进城。龙师长一只胳膊残废,两条腿脚却健步如飞。走到南开中学,教师们列队欢迎,龙师长叫我留下做老师们的工作。他带着尖刀师去打巷战!

和教师们谈了一阵,我走到街上,便有两个工人,主动给我带路。枪声稀少了,我看见战士们押着一群群俘虏,街头巷尾丢下许多枪炮,大炮上用粉笔写着缴获者的部队番号。

15日黎明,许多市民在拆除被蒋军抢去修地堡工事的门板木料,电车工人们列队欢迎解放军。电厂工人在修复被毁的线路。

16日上午,解放了的天津沸腾了!秩序恢复了,交通警察指挥来往的车辆。欢迎解放军的红绿标语贴满墙头。南开大

学和东北大学的秧歌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。我争取时间,写了篇《狂歡的天津》,交给天津《进步日报》(《大公报》),经新华社转播全国。

北平傅作义起义后,我到天津与从东北来的家人团聚,《大公报》的记者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常来找我索稿,我给她写《原封不动》与《复仇的火苗》等文章。

北平和平解放,陶铸同志叫我和杨朔同志提前一天入城,准备报道我军入城式。我和杨朔同志分头在永定门和西直门,观看解放军入城和北平人民热烈的欢迎呼喊!当晚合写了一篇报道,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

1950年,我作为第四野战军列席代表,参加全国英雄及劳动模范的代表大会,在天安门前观礼,以后又参加了几次观礼。

时隔60年,许多往事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,值此欢庆祖国六十华诞之时,我这个年过九旬的老兵,还能参加一次观礼,叫我能不高兴呢?

历时半年的“放歌60年”征文今天结束。感谢广大作者、读者热情支持,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副刊。

——编者

峡的高速公路也将动工,鄂西生态旅游连成一体,神农架将成为最大的游客中转站。虽然这隐隐地感到会对神农架的生态有破坏,但我相信,这个问题会被政府考虑和化解。神农架在上个世纪的宁静和古朴将不复存在,贫穷和落后也将不复存在。时代总是要发展的,人们会涌入它的怀抱,呼吸比城里高出十倍的负氧离子空气,感受它的山水之趣和人文之妙。60年神农架的变化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,对它的认知也经历了大起大落,天上地下。现在的神农架真正找到了它存在的价值,青山不老,绿水长流,与我们的祖国一起,永远年轻!



父亲的足迹

范稳

我的父亲在铁路工作,退休时的身份是“范师傅”。而在共和国成立伊始,父亲是大地主家的阔少爷。父亲去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因为癌症。我大学毕业后去云南工作,那些年每次回去看望父母,都看得见死亡的阴影在父亲的身后徘徊,他本来就瘦削的身子日益孱弱,最后的一两年连挪步都困难了。

可是父亲对归家的我,却总是有很多温情的话要说。忆旧大约是生命走到终点的人唯一的“精神财产”。一个晚上,我和父亲对坐孤灯下,父亲忽然向我提起了他的往昔。在过去,因为家庭成分问题,我们从小少吃苦头。“地主”是一项无形的帽子,像块厚重的乌云,永远罩在我们这个家庭里,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没有阳光。我上小学、中学时,最怕填各种表格,因为上面有一栏“家庭成分”,你不得不屈辱地填上“地主”一词。我恨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。

父亲说,过去我们家有良田千亩,可惜的是,他并不惜福。你想想,这种家庭的孩子,有几个是读得出书来的?在成都,他和一些有钱人家的阔少,不是推牌九打麻将,就是到梨园去追捧戏子,滋事惹祸。父亲苦笑道,要是那时懂些事,好生读书,怎么会像今天?

解放了,父亲回到老家,被农会命令去修铁路。那时成渝铁路刚开工,需要大量民工。父亲说,他是很不服气的,瘦了的骆驼比马大,一帮农民叫花子怎么可以对一个少爷指手画脚?他叫了一乘轿子,四川叫滑竿,坐着那滑竿耀武扬威地去工地报到。工地上的干部见这个少爷如此摆谱,当即气得大骂,你这个地主狗崽子,还以为你是旧社会吗?给我挖土方去!父亲讲到此处时,哑然失笑。少年时干的糊涂事,吃的苦头,两鬓斑白后,都

付与笑谈中了。

就这样随着铁路工程队转战四方。父亲修成成渝铁路、宝成铁路、成昆铁路、贵昆铁路,大西南几条重要的铁路都有父亲工作过的经历。地主家的阔少爷在共和国铁路的翻山越岭中,逐步被改造成了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母亲曾经对我回忆说,当年她第一次去父亲的工地上看望他,看到的是个叫花子,身上全是泥浆,没有一块布是干净的。

但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从来没有讲过自己修铁路有多苦。他只是说过在修成昆铁路时,山洞里塌方得厉害,他们拿不下来的工程,就交给铁道兵了。那些当兵的不怕死,人被埋里面了,挖出来后照样玩命上。我探亲时经常坐火车走成昆线,这条铁路几乎除了山洞就是桥梁。有时就会想:哪个山洞、哪条桥梁,留下过我的父亲曾经的足迹呢?

父亲去世后,我们整理他的遗物,发现了一本上世纪50年代的笔记本。其中一页是父亲的一篇学习体会。大意是工程队的书记对他说,你年轻有文化,要好好学习向老革命学习,努力改造自己,国家会重用一切有志青年。父亲在最后说,他要认真工作,争取加入共青团。

“文革”前父亲已经从工程队转到管理部门做财会工作了,并且在贵州落了脚,与母亲两地分居。“文革”时像他这种成分的人当然要受到冲击,被发配到一个煤矿接受改造。这一改造就是10年。“文革”后父亲平反,继续回原单位效力。那是父亲工作生涯的一段黄金时间,他的业务过硬,被任命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。他总是很忙,人们叫他“范师傅”。

父亲以“范师傅”的称谓退休、荣归故里。这个前地主家的阔少爷,少小离家老大还,从一个浪荡子转变成为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人。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,国盛家事兴;一个人的足迹也总是和历史前进的车轮步步相随,峰回路转,百折不挠。我庆幸父亲命运的转折,他的一生纵然吃了不少苦,但也不乏精彩和灿烂。他只是一个在旧时代出生,在新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普通人。在父亲的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、时代的变迁。

是啊,我们每个人都在共和国的成长中成长。

高原飞虹(彩墨画)

陈玉先

作品



60年前的神农架是个什么样子?从剿匪老革命的回忆录里了解到,当年的神农架人竟穿着棕丝织的衣服,一个脖子吊个大褡袋,眼睛通红,因为气温低常年烤火熏的。可是当年的神农架还有一片真正的财宝——原始森林。但是,上世纪70年代开始,开发神农架,山头成了一个个秃头。一些若隐若现的野人的传说和记忆,是她飘忽的存在。

可后来,她突然跃身一变,成了旅游的热门地,世界扬名。人们对神农架重新认识和刮目相看了,可这也就是近些年的事。

新世纪之初,“天保工程”得到国务院批准,农民退耕还林。神农架开始实行了全面的保护,转变思维,从木头经济向生态经济、砍树人向护林人转变,以旅游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。近几年,每到神农架都会发现,神农架已经大步地迈向了现代社会和生活。神农架在不经意之时,一连挂了3个“国家”牌:国家森林公园、国家地质公园、国家湿地公园。

神农架不只有砍不尽的木头,它更有令人神往的诸多风景和幽默。植被终于覆

神农架的变迁

陈应松

是为神农架增添了新的魅力。农民开发旅游产品,种香菇、木耳、板栗、核桃,养蜂、养羊、养牛,办“农家乐”,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,有的农民开餐馆、开旅店成了千万富翁。而神农架高山无公害蔬菜,也成了近几年大武汉超市中的紧俏品。更令人可喜的是,曾最让我忧心的那些基本无人管的孤寡老人、残疾人、弱智人,竟然之间由政府完全买断了。孤寡老人每月有几十元的补助,残疾、弱智人的低保,每月有一百多元。这在当地,基本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。新房一片连着一片,依山傍水,如在画中,建造得相当时尚。

神农架真的在变,而更多的惊喜在后头。神农架机场即将动工,通往武当山和三